

人际互动情境中虚假记忆的主动构建 ——“去个性化”在社会感染效应中的作用

王 慧 董 妍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872)

摘 要 个体的记忆会被他人输出的错误信息所扭曲, 从而形成虚假记忆, 这一现象被称为记忆的社会感染。现有研究多关注人际因素对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的影响, 但往往将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视为独立单元, 而忽略了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鉴于此, 本研究从互动动力学的视角深入探究记忆的社会感染的内在过程。互动模式作为一种基本的互动动力, 可能会影响社会感染效应的强度, 并且其影响途径可能与互动中的“去个性化”反应有关。未来研究可以验证“去个性化”反应发挥的作用并且进一步探究其作用机制。

关键词 虚假记忆, 社会感染效应, 互动动力, 去个性化, 互动模式

分类号 B849: C91

人类的记忆并不是准确无误的, 记忆是可塑的且可以被重构(Conway & Howe, 2022; Zacks et al., 2022)。记忆的可塑性导致人们错误地回忆发生过的事件, 甚至回忆起完全虚构的、从未发生过的事件(Loftus, 2005; Raposo, 2023), 由此出现虚假记忆。在小规模团体中形成的虚假记忆, 可以在更大、更复杂的社交网络中扩散(Luo et al., 2021), 从而影响个体和集体记忆的准确性。集体的虚假记忆反过来也会影响个人的行为和决策(Cordonnier et al., 2022; Luhmann & Rajaram, 2015)。如, 当虚假记忆涉及政治或社会历史事件时, 可能会导致个人在社会参与、投票选举或态度表达上的偏差(Verovšek, 2016)。鉴于虚假记忆在社会环境中的广泛性和破坏性, 研究其形成机制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也对应付虚假信息在群体中的传播和消除其负面影响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

1 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及其研究范式

虚假记忆并不完全是由个体内部的信息加工过程导致的, 即并不总是自发生成的, 而是可以通过外部媒介或社会互动被塑造(Abel & Bäuml,

2020, 2023)。当个体通过人际互动将他人输出的错误信息(也称“事后信息”或“二手信息”)整合到自己的记忆中, 对原始信息产生记忆扭曲时, 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便发生了(Hart & Meade, 2021; Ito et al., 2019)。例如, 个体可能会通过亲戚的讲述而回忆起自己小时候根本没有经历过的一些事件(Loftus, 2005; Oeberst et al., 2021)。社会互动中错误信息的可获得性及记忆的可塑性共同造成了记忆表征的错误。

研究者使用社会感染范式和社会从众范式对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进行研究(Maswood & Rajaram, 2019)。这两个范式都包含三个基本的环节: 编码原始信息—与他人互动并接触他人输出的错误信息—个体单独回忆。在这两个范式中, 都包含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这两种角色。区别在于, 在社会感染范式中(Andrews-Todd et al., 2021; Hart & Meade, 2021), 真被试(接收者)与假被试(发送者)一同编码信息, 然后他们共同尽可能多地回忆这些信息。此时, 假被试会插入一些与原始信息不符的信息。最后, 真被试独自完成关于原始信息的回想或再认任务。在社会从众范式中(Ito et al., 2019; Kękuś et al., 2024; Monds et al., 2019), 不会使用假被试, 而是由两个真实的参与者编码不同版本的信息(例如, 在一个版本中,

收稿日期: 2024-10-15

通信作者: 董妍, E-mail: dong8958@126.com

罪犯看的是手表,而在另一个版本中,罪犯看的是挂钟),这种方式使参与者各自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信息,但实验人员会引导参与者相信他们编码的信息是相同的。之后,两名参与者分别作为信息发送者和信息接收者,共同进行回忆,在这一过程中,接收者自然而然地会接触到一些与自己原本记忆过的信息有出入的内容。最后,再进行各自的单独回忆。社会感染范式与记忆从众范式的不同之处在于错误信息的引入方式,差别主要存在于信息发送者层面,对信息接收者而言则没有实质差别。

2 影响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的因素

2.1 情境与信息层面

情境层面的影响来自实验任务的不同环节(编码、互动、检索)。在信息编码环节,当原始信息的呈现时间较短时,更容易发生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Roediger et al., 2001)。在互动环节,实验者往往通过引导,让参与者相信他们与同伴所接收到的信息是相同的(Bodner et al., 2009),这会降低参与者对错误信息的警觉性,从而增加社会感染效应的发生概率。另一方面,如果在互动前要求参与者先进行独立的记忆提取,那么这可能会增强对原始信息的巩固从而降低在后续环节中对错误信息的易感性(Abel & Bäuml, 2020; Huff et al., 2013)。在检索环节,检索任务的类型和外部提示对社会感染效应的强度也有重要影响。例如,使用来源再认任务而非自由回忆任务可以有效减少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Multhaup, 1995)。提醒参与者其同伴回答可能不准确(闫阅 等, 2015; Huff et al., 2013; Kękuś et al., 2024),明确告知参与者不要与编码后接触到的信息混淆(Bodner et al., 2009; Echterhoff et al., 2005; Hirst & Echterhoff, 2012),或给予参与者更严格的指示,要求准确回忆(Wright et al., 2008),都能够减弱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Ecker et al., 2014; Huang et al., 2024)。

在信息层面,当错误信息与原始信息的相似性较高时,参与者更容易将错误信息整合到自己的记忆中,从而加剧社会感染效应(Meade & Roediger, 2002; Roediger et al., 2001)。此外,情绪化或具有价值负载的信息比中性信息更容易引发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Kensinger et al., 2016; Vosoughi et al., 2018)。

2.2 人际层面

诸多研究关注人际层面的影响因素,特别是与信息发送者有关的因素。总体而言,当接收者对同伴,即错误信息发送者持高信任态度时,继而也会认为同伴输出的信息是准确的(Kękuś et al., 2021; Polczyk, 2017; Szpitalak & Polczyk, 2019)。一些研究通过操纵发送者的记忆能力和身份来改变接收者对信息的来源可靠性的感知,发现来源可靠性是产生社会感染效应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Gabbert et al., 2007; Horry et al., 2012)。Monds 等人(2019)让参与者与记忆能力比自己低、和自己相当或比自己高的假被试合作回忆。结果发现,那些意识到同伴的记忆能力更好的参与者更容易产生社会感染现象。元认知问卷测量结果表明当参与者觉得自己的记忆力相对较差时,合作回忆时的错误信息才会降低他们在后续的独立测试中的记忆准确性。French 等人(2011)操纵了参与者的视力与同伴视力之间的差异。在最后的再认测试中,那些认为自己的视觉敏锐度比同伴高的参与者不太容易受到同伴输出的错误信息的影响。以往研究还发现,个体不太可能接受与自己不同年龄段(Davis & Meade, 2013; Meade et al., 2017; Numata et al., 2020)和来自外群体他人的错误信息(Andrews & Rapp, 2014)。对亲密的人(Mojtahedi et al., 2018)、有相关专业知识的人(Mojtahedi et al., 2020; Williamson et al., 2013)或更自信的人(Allan & Gabbert, 2008; Goodwin et al., 2017)输出的信息则更多地认为是可靠的。

人际层面的影响因素还与信息接收者有关。接收者的人格特质,如宜人性(Doughty et al., 2017)、社会回避(Wright et al., 2010),自尊和自信水平(Monds et al., 2019; Thorley & Kumar, 2017)等都会直接影响对错误信息的接受程度。

3 新的视角:从互动动力学的角度探究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

以往研究倾向于将信息接收者和发送者作为参与互动的独立单元,但既然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来自于社会互动情境,那么就有必要考虑到与发送者和接收者的互动有关的因素。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信息的简单传递,个体的行为往往是与社会情境中的其他成员共同交互的结果(Newcomb et al., 2015)。有研究发现,当错误信

息由发送者提前输出,然后再呈现给参与者,而不是在实时互动中产生时,那么个体便相对较少地与发送者的回答保持一致(Allan & Gabbert, 2008)。而只有在与他人进行实时互动时,接收者的回答才更容易与事后信息保持一致。因为在互动过程中成员会评估彼此的心理状态和意图(Koike et al., 2016),并根据社会规范动态地调整其认知和行为方式。因此有必要关注接收者与发送者的动态交互特征,探讨接收者与发送者在群体情境中的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接收者在脱离群体互动后的记忆扭曲,即从群体/互动动力学的角度探究记忆的社会感染。

群体动力学理论指出,互动模式是一种基本的群体动力。它是社会互动中影响群体成员行为和态度的重要部分(Garvin et al., 2017)。依据互动媒介、场合的不同,与同样的信息发送者可以有不同的互动模式。常见的互动模式包括:(1)辐射式:领导者是中心人物,团体中的沟通以领导者为中心向团体成员传递,成员的沟通对象也是领导者;(2)轮流式:又称为圆圈型,成员一个接一个轮流发言;(3)热座式,一位成员与领导者或两位成员之间进行交流,其他成员则充当观察者的角色;(4)自由式,在这种模式中,所有成员之间可以自由地进行交流。有时,研究者也将“群体动力学”称为“互动动力学”(Provenzi et al., 2018)。“互动动力学”是多个概念的总称,涵盖了与社交伙伴如何在社交互动中相互影响和共同构建意义(Boorum & Liu, 2024; De Jaegher, 2013)。鉴于与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有关的研究也使用了“互动动力学”这一术语(Maswood et al., 2022; Saraiva & Garrido, 2024),本文也沿用此表述。总之,互动动力学涉及成员在互动过程中动态地适应和回应彼此,但彼此在行为的频率和强度上可能并不对等(Boorum & Liu, 2024; Provenzi et al., 2018)。

Saraiva 和 Garrido (2024)的研究表明互动模式的变化可能会直接影响个体对错误信息的反应和个体记忆的重构。在这一只有两名参与者的二元互动中,研究者对比了“轮流”(Marion & Thorley, 2016; Maswood et al., 2022; Saraiva et al., 2017)和“自由”(Harris et al., 2012; Marion & Thorley, 2016; Maswood et al., 2022; Maswood & Rajaram, 2019; Vredeveltdt et al., 2017)这两种模式

的互动对虚假记忆的影响(Maswood et al., 2022; Saraiva & Garrido, 2024; Thorley & Dewhurst, 2007)。在轮流式互动组,参与者轮流回答与原始信息有关的问题,并记录下自己的和其他成员的答案,相互之间不允许讨论。在自由式互动组,参与者之间可以自由交流,且必须就每个问题的答案达成共识才能继续回答下一个问题。这两种互动模式所反映出的互动动力学的区别表现在:轮流式的互动程度要低于自由式。轮流式互动属于单向信息传递模式,其特点在于参与者仅接收他人分享的信息而无需给出反馈。相比之下,自由式互动则采用双向信息交换模式,允许参与者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反馈并表达个人态度。研究发现在互动过程中,自由式互动比轮流式互动产生的对错误信息的虚报更少,并且在后续的个人检索阶段,曾参与自由式互动的个体回忆出的错误信息也更少。在另一些研究中(Maswood et al., 2022; Thorley & Dewhurst, 2007),也发现轮流式互动导致参与者在后续的个人检索阶段产生更多的虚假记忆。

但是, Saraiva 和 Garrido (2024)的研究只能说明互动过程中的交流和反馈有助于参与者拒绝互动中出现的错误信息,无法证明互动模式对社会感染效应的直接影响。因为在自由式互动中,成员间会通过讨论对错误信息进行修正,即所谓的错误修剪(孙亚茹 等, 2023)。错误修剪会纠正部分错误信息。而在轮流式互动中,小组成员无法纠正错误,或者以其它方式相互提供反馈。这使得两组的参与者在进行最后的独立检索之前,接触到的错误信息的数量其实是不同的。两种互动模式下暴露出的错误信息的数量和内容不同,所以最终的个人回忆阶段,回忆出的错误信息的数量也有所不同。虽然现有研究未能排除此类因素对结果的潜在干扰(Maswood et al., 2022; Saraiva & Garrido, 2024; Thorley & Dewhurst, 2007)。但这些研究为进一步探讨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未来的研究可以在确保参与者接触到相同数量和内容的错误信息的基础上,检验不同互动模式对社会感染效应的直接影响。这将有助于深入理解互动动力学在错误信息传播和记忆重构中的作用,为减少虚假记忆的产生提供更加充分的理论依据。接下来本文将探讨互动模式影响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的机制。

4 互动模式影响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的机制

4.1 产生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的机制

Betz 等人(1996)提出了三种导致与他人记忆保持一致的途径。第一种,由个人记忆被扭曲带来的记忆的社会感染。第二种被称为信息性影响,第三种被称为规范性影响,规范性影响是本文着重关注的机制。

4.1.1 由个人记忆被扭曲带来的记忆的社会感染

当被要求回忆原始信息时,经历记忆扭曲的人可能会无意识地报告出事后信息,认为这是他们对原始信息的真实回忆,而没有意识到这些信息是从二手来源获得的。因为从二手来源获得的信息已经存储在记忆中,即事后信息已经与其源头解离并被内化。Loftus (1993)形象地将事后信息比作“特洛伊木马”,因为个体通常未能意识到它带来的负面影响。传统上基于 DRM 范式提出的、用于解释自发性虚假记忆的认知理论,也被延伸用于解释个人记忆为何会被事后信息所扭曲,如来源监控理论(Gronchi et al., 2023; Pena et al., 2017)、模糊痕迹理论(Abadie & Camos, 2019; Brainerd & Reyna, 2019)、内隐激活反应理论(Sanderson & Ecker, 2020)等。它们都有一个基本假设:虚假记忆与记忆相关的认知过程有关,通常是由于在编码、存储或检索环节出了问题(郭滢等, 2021),并且通常情况下,这些记忆过程中的“失误”都是无意识产生的。这一途径主要聚焦于个体内部的记忆过程,不关注互动过程中涉及到的社会因素。因此,当我们探究互动模式对记忆的社会感染的影响时,这一机制并非核心关注点。

4.1.2 由信息性影响造成的记忆的社会感染

也有研究表明,社会感染效应的产生不应完全归因于认知过程中的错误,还应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加以解释(Polczyk, 2017)。即使参与者意识到同伴提供的信息与原始信息不一致,甚至当这些事后信息对他们回忆原始信息的能力没有任何影响时,虚假记忆仍可能出现(Kękuś et al., 2021)。信息性影响可以通过以下陈述来说明:“我认为答案是‘X’(或‘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但其他人都说是‘Y’,所以答案肯定是‘Y’。”当被要求回忆原始信息(“X”)时,个体回忆起事后信息(“Y”),并准确记得这是他人提供的。然而,个体

也相信这些事后信息(“Y”)正确反映了原始信息(“X”)。

McCloskey 和 Zaragoza (1985)的研究首先探讨了这一可能。在实验中,如果原始信息是“锤子”,事后的误导信息是“螺丝刀”,那么在最终的测试中,参与者需要在原始信息和无关信息(如“扳手”)之间做出选择,而不是在原始信息(“锤子”)和事后信息(“螺丝刀”)之间做出选择。McCloskey 和 Zaragoza (1985)指出,如果阅读事后误导信息确实对原始信息的记忆有负面影响,那么被误导的参与者选择正确选项(“锤子”)的概率应当低于未被误导的参与者。然而实验结果并非如此。McCloskey 和 Zaragoza (1985)认为,没有证据表明事后信息对原始信息的记忆有负面影响。在先前的研究中,通过让参与者在原始信息和事后信息之间进行选择获得的结果,不应该从记忆过程(编码—巩固—检索)的角度进行解释。参与者有可能同时记住了原始信息和事后信息,但在回答相关问题时选择了后者,因为他们更相信他人的叙述而不是自己的记忆。

后来,研究者提出了“整合模型”(Blank, 1998, 2005),该模型认为个体在检索信息时,实际上面临的是问题解决任务,个体试图找到关于记忆任务的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不仅依赖于记忆中的原始信息,还取决于参与者对记忆任务的内部表征。一般情况下,参与者对任务的内部表征遵循“一致性假设”,即在我们的日常交流中,通常假定对话者不会故意传播错误或缺乏依据的信息,否则就违反了哲学家 Grice (1975)提出的人类交流中的合作原则。因此,人们总是默认与之交流的人输出的信息是可信的。当个体意识到原始信息和事后信息之间的差异时,他们会尝试对这种差异做出解释。比如,是自己记错了。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解释可能会使记忆偏离客观情况,从而导致虚假记忆的发生。在 Blank (1998)的第一个实验中,参与者发现了原始信息和事后信息之间的差异。并且,在超过 40%的情况下,他们仍然给出了与错误信息一致的答案。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参与者怀疑自己的记忆能力。

信息性影响强调,参与者对事后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判断是决定其如何评估事后信息准确性的关键因素。现有研究也表明,对事后信息来源的

信任往往会导致更程度的社会感染(Kękuś et al., 2021; Polczyk, 2017; Szpitalak & Polczyk, 2019)。然而,这一途径也无法作为互动模式影响社会感染效应的核心机制。因为面对同一发送者,不同的媒介和情境可能会触发不同的互动模式。目前尚无研究明确表明,互动模式的变化会直接导致个体对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判断发生变化。

4.1.3 由规范性影响造成的记忆的社会感染

规范性影响关注互动过程中个体的社会性认知。规范性影响可以通过以下陈述来说明:“我认为答案是‘X’,但其他人说是‘Y’,我不想惹麻烦,所以我会说‘Y’。”但内部信念并未发生变化(仍然认为答案是‘X’)。个体同时拥有原始信息(“X”)和事后信息(“Y”)。尽管能够回忆起原始信息,个体却以社会可接受的方式作出反应,重复事后信息。

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去个性化”是规范性影响的一种具体体现。当个体身处群体中时,其内部的道德或价值观会减弱,并且出于社会认同或寻求归属感,个体倾向于与群体规范或群体情绪保持一致(Diener, 1979; Festinger et al., 1952; Zimbardo, 1969),而不是根据自己的个人特征或价值观行动,由此产生“去个性化”(Chan et al., 2023; Vilanova et al., 2017)。Asch (1955)的研究早已表明,在社交场合,人们会为了遵守群体规范和获得社会认同而放弃自己的正确判断。还有研究表明在互动过程中出于社会影响而做出的短暂的知觉调整会带来稳定且持久的知觉改变(Zhan et al., 2025)。在记忆研究中,Allan 和 Gabbert (2008)的实验 2 发现,在互动过程中,无论参与者面对正确还是错误答案,都会倾向于依从他人。这种依从导致其正确率相较基线水平(未接触他人答案时,独立作答的正确率)发生波动:当他人提供错误答案时,参与者的正确率下降;当他人提供正确答案时,正确率又上升。研究者从信息性影响的角度解释了这一结果,但无法排除参与者因社会压力而顺从他人的可能,即规范性影

响可能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规范性影响是本文所关注的互动模式影响记忆的社会感染的核心机制,接下来的部分将对这一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进行详细论述。

4.2 互动模式影响记忆的社会感染的机制:“去个性化”

4.2.1 互动过程中的“去个性化”

类比于社会心理学中经典的“去个性化”,在进行记忆互动时,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行为。在群体记忆中,当他人输出错误信息时,个体的观点更可能与他人保持一致。因为个体不仅受与任务相关的认知需求的驱动(正确回忆编码过的信息),也会受规范性影响的驱动(Allan & Gabbert, 2008; Ekeocha & Brennan, 2008)。规范性影响可以从两个层面解释,在个人层面,个体有着维持积极自我形象、避免负面评价的需求(Ribino, 2023; Steinmetz et al., 2017; Wright et al., 2010)。当信息接收者提出与发送者不同的意见时,若遭到质疑,可能会感到丢脸、自尊受损。或者,如果信息接收者明确反对他人的意见,接收者可能会认为这种行为是不礼貌的,会损害他人的自尊(陈文平等, 2013)。所以,出于社会印象管理的考虑,个体可能会选择放弃自己的正确记忆而认同他人输出的信息。在群体层面,个体有着遵守群体规范的需求(Fehr & Schurtenberger, 2018),特别是在东亚文化中,维持集体的和谐,“不冒尖”显得尤为重要(Huang, 2024)。这使得信息接收者对错误信息的态度并不只依据自身持有的记忆,还会考虑群体目标、规范等因素,选择性地输出或改编自己持有的信息。不论是个人层面还是群体层面,个体都可能会主动放弃自己的观点,选择接受他人的错误信息,即出现记忆的“去个性化”(图 1)。

以往研究认为虚假记忆是被错误信息“植入”的结果,这一结果主要是由于个体在互动中未能识别出错误信息而造成的。在本文中,“去个性化”强调的是个体识别出了他人输出的错误信息但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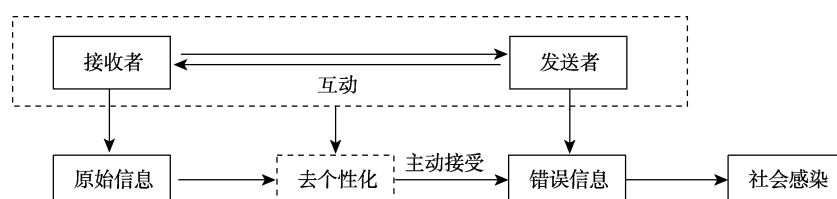


图 1 社会互动通过“去个性化”产生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的过程

然选择认同与接受,是一种有意而为之的主动选择。

4.2.2 互动模式的差别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去个性化”

不同的人际互动模式往往带来不同程度的社会压力(Thorley & Dewhurst, 2007),由此引发的“去个性化”的程度可能也是不同的。具体而言,在轮流式互动中,参与者依次进行回忆,相互之间不进行交流,社会压力较小。在自由式互动中,参与者之间对任意一名成员回忆出的信息进行讨论,直到达成一致。自由式互动中的社会压力更大,如前面提到的维护自我及他人自尊、避免争执、遵守群体规范,促进团体和谐等(Smith & Postmes, 2011)。在这样的互动模式中,个体更可能受到规范性的影响而压抑自己的想法,转而接受他人输出的错误信息。而在轮流式互动情境下,由于个体仅需承担接收信息的任务而无需提供反馈,社会性因素(如维护群体和谐)的影响显著降低,其行为较少受规范性影响的驱动,个体拒绝不认同信息的心理阈限降低。个体能够基于自身真实感受进行相对独立的信息加工。虽然 Thorley 和 Dewhurst (2007)的研究关注的是不同的社会压力情境会如何影响自发性的虚假记忆,而不关注社会压力如何影响对他人输出的信息的反应,但这一研究强调了不同的互动模式中的社会压力的差别及其对记忆扭曲的重要作用。

但目前尚不清楚的是,个体在群体中的“去个性化”反应是否会导致个人真实记忆的扭曲,因为“去个性化”反应是参与者在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权宜之计”,在互动结束后,是否会改变个体原有的正确记忆,仍有待研究。

4.2.3 “去个性化”可能会造成记忆的社会感染

如果个体在互动中出现了“去个性化”行为并且在脱离人际情境后,将互动中出现的错误信息作为原始信息进行回忆,就表明互动中的“去个性化”行为确实会扭曲个人的真实记忆。也就是说,社会感染效应的产生不仅取决于信息发送者的输出,接收者的“主动妥协”同样是促成这一结果的重要因素。尽管错误信息最初是由他人引入的,但最终是由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将其整合进自己的记忆的,而不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他人“植入”。虽然目前并没有研究直接对以上可能进行验证,但是参考关于说谎与记忆的相关研究,

也可以间接地说明对于原始信息的主动修改不仅仅在群体互动时暂时存在,而且可能会在后续持续扭曲个人回忆。

研究发现说谎会扭曲记忆。这类研究的实验流程也分为三个基本的环节。首先,参与者观看视频或执行某些动作。随后参与访谈,在访谈中就编码过的内容进行诚实回答(诚实组)或提供虚假回答(说谎组)。访谈两天后或者更长时间后进行独立记忆测试,即如实回忆编码过的内容。两组在最终的记忆测试中的表现差异用于评估说谎对记忆的影响。研究通常发现,说谎组的记忆表现不及诚实组,甚至会将谎言误认为是原始信息,这表明说谎会导致虚假记忆(Battista et al., 2021; Otgaar et al., 2016; Otgaar & Baker, 2018; Riesthuis, Otgaar, De Cort, et al., 2022; Romeo et al., 2019)。但这些结果均来自于被迫说谎(实验要求参与者必须说谎)的情况。

考虑到“说谎”是一种有目的的、故意的行为(DePaulo et al., 2003),意向性(intention)是说谎的重要特征(Walczyk et al., 2014),有研究探讨了自愿说谎对记忆的影响,同样也发现了其对原始记忆的损害(Li et al., 2022; Riesthuis, Otgaar, Hope, et al., 2022)。在 Riesthuis, Otgaar, Hope 等人(2022)的研究中,参与者与假被试(由电脑程序模拟)轮流投掷骰子,并向对方报告自己的投掷点数。在报告投掷点数时,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强激励说谎”和“弱激励说谎”两种条件。在“强激励说谎”条件下,说谎能避免经济惩罚,说谎的结果是利己的。在“弱激励说谎”条件下,说谎可使他人受益,但自身无实际损益。在两种条件下,参与者均可自行决定是否说谎。两天后,考察参与者对骰子投掷点数的记忆。结果发现,在两种条件下,分别有 38%和 35%的参与者说了谎,且说谎者比诚实者产生了更多虚假记忆,但虚假记忆在两种说谎条件下无显著差异。因此,无论出于何种动机,自愿说谎都会导致记忆扭曲。

也有研究专门探讨了被迫说谎和自愿说谎对记忆的不同影响。Dianiska 和 Meissner (2023)的研究使用了物体范式,包含动作、复述和测试三个环节。在动作环节,参与者执行指定动作,接着在复述环节描述自己是否执行过这些动作。自愿组的参与者自行决定是否说谎,对于执行过的动作,可以如实描述,也可以虚假否认;对于未执

行过的动作,可以如实否认,也可以虚构描述。而强制组的参与者则必须说谎。一星期之后的测试环节,参与者需要回答在动作环节是否执行过某项动作。结果发现,对于未执行过的动作,说谎者更可能错误地记得自己曾执行过该动作,且未发现被迫说谎组和自愿说谎组在虚报率上有任何差异。但也有其他研究表明当参与者自愿提供错误信息时,这些错误信息更有可能成为持久的记忆。比如, Pezdek 等人(2007)的研究发现,与被迫虚构答案的参与者相比,自愿虚构答案的参与者更有可能在第二次记忆测试中重复虚构的答案。总之,不论是被迫说谎还是自愿说谎,不论自愿说谎出于哪种动机,谎言本身都可能会在后续的记忆测试中被当作事实。

关于说谎与记忆的研究为我们提出“互动中的‘去个性化’可能会持续更改个人在互动后的记忆”提供了支持。传统说谎研究(特别是自愿说谎)中的错误信息(即谎言)是由参与者主动生成的,本研究关注的“去个性化”情境下的错误信息是由他人生成然后被参与者主动接受的。虽然错误信息的来源不同,但是它们都强调主动且有意识地对初始正确信息的否定会对个人的真实记忆产生不利的影响。

5 总结与研究展望

本文从互动动力学视角探讨了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重点分析了互动模式对记忆扭曲的影响。互动模式作为一种基本的互动动力,可能会通过互动过程中的“去个性化”反应来影响社会感染效应的强度。从互动动力学的视角考察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和社会意义。在科学价值上,能够为研究错误信息在社会互动中被个体接受和内化的机制提供参考。在社会意义上,理解不同互动模式下错误信息的传播机制有助于制定有效的防范措施。例如,在群体讨论或决策中,避免一开始就进入自由式讨论,而是先要求每个个体独立输出自己的观点。此外,了解“去个性化”对记忆的影响,也有助于设计更具针对性的干预策略,如加强群体中的信息验证与反思机制,鼓励信息接收者保持独立判断等。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5.1 准确测量“去个性化”反应的发生

“去个性化”是规范性影响的一种具体体现,

未来研究应注意将人际互动中的规范性影响与信息性影响进行明确区分。在现有的探讨记忆的社会感染效应的研究中,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参与者在互动中给出的回答是否与他人保持一致(Allan & Gabbert, 2008),这是一种行为层面的反应,但仅凭行为一致性无法说明记忆的社会感染是通过信息性影响还是规范性影响产生的。因为在互动过程中与他人保持一致既可能是真的认同他人的观点,即信息性影响,也可能是因为社会压力而调整了自己的回答,即规范性影响。未来的研究应关注参与者在接触到错误信息时对于信息的认知判断。当发送者向接收者输出错误信息时,接收者可能出现三种判断:判断为正确,判断为错误,判断为不确定。这三种认知判断都可能导向相同的行为反应。但不同的判断却对应不同的影响机制。如,当判断为不确定时,可能会因为信息性影响而认同事后信息,当判断为错误时,却会因为规范性影响而认同事后信息。因此,并不是与他人有着一致的反应就说明发生了“去个性化”,而应强调认知判断与行为反应之间的关系。不一致的判断加上一致的反应,才能共同说明“去个性化”的发生。

为了操纵“去个性化”的发生,研究不仅需要创设让参与者与他人反应一致的情境,还应确保他人提供的信息与参与者的观点不一致,这是“去个性化”发生的重要前提。未来研究可采用“先独立后互动”的实验设计(Horry et al., 2012; Maswood et al., 2022; Saraiva & Garrido, 2024),即在互动环节前设置个体独立检索阶段,以此建立对原始信息的基线记忆水平。在互动中若参与者的反应不仅与他人一致,也与互动前独立判断一致,说明未发生“去个性化”。此外,在互动后,也需要参与者就互动过程中的感受进行评价,如做出的反应在多大程度上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总之,未来的研究需准确测量“去个性化”的发生,防止将其与信息性影响混淆。

5.2 关注记忆提取的延迟间隔的影响

记忆的更新(memory updating)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与真实记忆相比,虚假记忆有时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Seamon et al., 2002)。再激活/再巩固假说认为,当我们检索一段记忆时,神经网络中的记忆痕迹会被重新激活,这段记忆并不是简单地从大脑中提取出来,而是进入一种可塑性

状态,这使得记忆更加灵活并能够整合新的信息(郭滢等, 2021; Carneiro et al., 2021; Chan & LaPaglia, 2013)。依据这样的观点我们推测,出现在互动阶段的每个刺激都具有记忆上的可塑性,而对那些他人判断与自己的原有判断不一致的信息的表征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且容易被修改,由于他人判断的“干扰”,个体很难对原始信息形成一致的、固定的表征(Lehman & Malmberg, 2013; Osorio-Gómez et al., 2023),因而更容易发生记忆的扭曲。在以往的研究中,当接触了他人提供的错误信息或者自己说谎后,对于错误信息或谎言的记忆并不是立刻出现的,而是在经过两天(Riesthuis, Otgaar, De Cort, et al., 2022; Riesthuis, Otgaar, Hope, et al., 2022; Vieira & Lane, 2013)、三天(Dianiska & Meissner, 2023)、七天(Dianiska & Meissner, 2023; Mangiulli et al., 2020; Pezdek et al., 2007; Polage, 2019)或一个月后(Riesthuis, Otgaar, De Cort, et al., 2022)测量到的。这表明离线过程(如睡眠)可以将整合了新信息后的不稳定的记忆表征巩固为稳定的表征(Schacter et al., 2011)。因此,由“去个性化”行为引发的社会感染效应可能具有延迟显现的特点。未来研究需延长提取时间间隔(retrieval interval),以充分观测记忆更新的动态过程。

5.3 探讨“去个性化”导致虚假记忆的原因

在关于说谎导致记忆扭曲的研究中,研究者认为说谎相对诚实叙述而言,需要消耗更多的认知资源(Battista et al., 2021; Otgaar & Baker, 2018)。因此造成了对原始记忆的损害。也有研究者认为,认知失调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在自愿说谎的情况下。诚实是大多数文化的默认规则,而欺骗通常被认为是不道德的。人们在违反规则或内心的真实信念时会经历认知失调(Pfister et al., 2016)。为了减少认知失调,个体可能会抑制基于普世规则的反应(说实话)(Li et al., 2022),或改变自己的原始信念,承认谎言的合理性,由此导致虚假记忆(Rodriguez & Strange, 2015)。有研究者使用诱发依从范式,三次测量了参与者对学费上涨的态度(1~11 评分)。第一次为初始测量,第二次是将参与者分为被动说谎组和自愿说谎组,写下支持学费上涨的陈述后,测量其当下真实态度;第三次是在两天后,要求参与者回忆初始测量时的评分(Rodriguez & Strange,

2015)。研究者计算了“态度转变”和“记忆转变”两个指数。态度转变指说谎任务后测得的真实态度(第二次测量)与初始态度(第一次测量)之间的差值,记忆转变指回忆中的原始态度(第三次测量)与真实的原始态度之间的差值。结果显示,与那些被动支持与初始态度相反提议的参与者相比,主动支持的参与者变得更倾向于支持学费上涨,即有着更大程度的态度转变,并且对原始态度产生更大程度的错误回忆,即有着更大程度的记忆转变。研究者认为态度转变是在减少认知失调的驱动下产生的。此外,态度转变在说谎(对被动和自愿两种条件进行哑变量编码)和记忆转变之间起到了中介作用。

在本文中,“去个性化”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说谎行为,因为“去个性化”意味着对不符合个人记忆的信息表达赞同。当做出“去个性化”行为后,个体也可能体会到内心信念和实际行为之间的冲突,即产生认知失调。那么,在“去个性化”反应的基础上,社会感染效应是否源于个体为了减少认知失调而在内心改变自己的原始信念,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这一可能。

参考文献

- 陈文平, 段锦云, 田晓明. (2013). 员工为什么不建言: 基于中国文化视角的解析. *心理科学进展*, 21(5), 905-913.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13.00905>
- 郭滢, 龚先旻, 王大华. (2021). 错误记忆产生的认知与神经机制: 信息加工视角. *心理科学进展*, 29(1), 79-92. <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21.00079>
- 孙亚茹, 刘泽军, 段亚杰, 陈宁, 刘伟. (2023). 协作如何减少记忆错误: 一项元分析研究. *心理学报*, 55(11), 1780-1795. <https://doi.org/10.3724/SP.J.1041.2023.01780>
- 闫阅, 徐建平, 彭宇. (2015). 重复测量和具体警示对错误信息效应的影响. *心理与行为研究*, 13(4), 485-489.
- Abadie, M., & Camos, V. (2019). False memory at short and long term.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48(8), 1312-1334. <https://doi.org/10.1037/xge0000526>
- Abel, M., & Bäuml, K.-H. T. (2020). Social interactions can simultaneously enhance and distort memories: Evidence from a collaborative recognition task. *Cognition*, 200, 104254.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20.104254>
- Abel, M., & Bäuml, K.-H. T. (2023). Joint contributions of collaborative facilitation and social contag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shared memories in social groups. *Cognition*, 238, 105453.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23.105453>
- Allan, K., & Gabbert, F. (2008). I still think it was a banana: Memorable 'lies' and forgettable 'truths'. *Acta Psychologica*,

- 127(2), 299–308. <https://doi.org/10.1016/j.actpsy.2007.06.001>
- Andrews, J. J., & Rapp, D. N. (2014). Partner characteristics and social contagion: Does group composition matter?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8(4), 505–517. <https://doi.org/10.1002/acp.3024>
- Andrews-Todd, J., Salovich, N. A., & Rapp, D. N. (2021). Differential effects of pressure on social contagion of memor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27(2), 258–275. <https://doi.org/10.1037/xap0000346>
- Asch, S. E. (1955). Opinions and social pressure. *Scientific American*, 193(5), 31–35.
- Battista, F., Mangiulli, I., Riesthuis, P., Curci, A., & Otgaar, H. (2021). Do liars really remember what they lied upon? The impact of fabrication on memory. *Memory*, 29(8), 1076–1090.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1.2021.1960380>
- Betz, A. L., Skowronski, J. J., & Ostrom, T. M. (1996). Shared realities: Social influence and stimulus memory. *Social Cognition*, 14(2), 113–140. <https://doi.org/10.1521/soco.1996.14.2.113>
- Blank, H. (1998). Memory states and memory task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eyewitness memory and suggestibility. *Memory*, 6(5), 481–529. <https://doi.org/10.1080/741943086>
- Blank, H. (2005). Another look at retroactive and proactive interference: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onversion processes. *Memory*, 13(2), 200–224. <https://doi.org/10.1080/09608210344000698>
- Bodner, G. E., Musch, E., & Azad, T. (2009). Reevaluating the potency of the memory conformity effect. *Memory & Cognition*, 37(8), 1069–1076. <https://doi.org/10.3758/MC.37.8.1069>
- Boorum, O., & Liu, T. (2024). A scoping review of interaction dynamics in minimally verbal autistic individual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5, 1497800.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4.1497800>
- Brainerd, C. J., & Reyna, V. F. (2019). Fuzzy-trace theory, false memory, and the law. *Policy Insights from the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6(1), 79–86. <https://doi.org/10.1177/2372732218797143>
- Carneiro, P., Lapa, A., & Finn, B. (2021). Memory updating after retrieval: When new information is false or correct. *Memory*, 29(9), 1156–1175.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1.2021.1968438>
- Chan, J. C. K., & LaPaglia, J. A. (2013). Impairing existing declarative memory in humans by disrupting reconsolid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0(23), 9309–9313. <https://doi.org/10.1073/pnas.1218472110>
- Chan, T. K. H., Cheung, C. M. K., Benbasat, I., Xiao, B., & Lee, Z. W. Y. (2023). Bystanders join in cyberbullying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e deindividuation and moral disengagement perspectives.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34(3), 828–846. <https://doi.org/10.1287/isre.2022.1161>
- Conway, M. A., & Howe, M. L. (2022). Memory construction: A brief and selective history. *Memory*, 30(1), 2–4.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1.2021.1964795>
- Cordonnier, A., Rosoux, V., Gijs, A.-S., & Luminet, O. (2022). Collective memory: An hourglass between the collective and the individual. *Memory, Mind & Media*, 1, e8. <https://doi.org/10.1017/mem.2022.1>
- Davis, S. D., & Meade, M. L. (2013). Both young and older adults discount suggestions from older adults on a social memory test.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20(4), 760–765. <https://doi.org/10.3758/s13423-013-0392-5>
- De Jaegher, H. (2013). Embodiment and sense-making in autism. *Frontiers in Integrative Neuroscience*, 7, 15. <https://doi.org/10.3389/fnint.2013.00015>
- DePaulo, B. M., Lindsay, J. J., Malone, B. E., Muhlenbruck, L., Charlton, K., & Cooper, H. (2003). Cues to deceptio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9(1), 74–118.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29.1.74>
- Dianiska, R. E., & Meissner, C. A. (2023). The effect of lying on memory and metamemory when deception is repeated and voli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12(1), 128–140. <https://doi.org/10.1037/mac0000036>
- Diener, E. (1979). Deindividuation, self-awareness, and disinhibi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37(7), 1160–1171.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37.7.1160>
- Doughty, N., Paterson, H. M., MacCann, C., & Monds, L. A. (2017). Personality and memory conformity. *Journal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8(1), 12–20. <https://doi.org/10.1027/1614-0001/a000217>
- Echterhoff, G., Hirst, W., & Hussy, W. (2005). How eyewitnesses resist misinformation: Social postwarnings and the monitoring of memory characteristics. *Memory & Cognition*, 33(5), 770–782. <https://doi.org/10.3758/BF03193073>
- Ecker, U. K. H., Lewandowsky, S., Chang, E. P., & Pillai, R. (2014). The effects of subtle misinformation in news headlin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Applied*, 20(4), 323–335. <https://doi.org/10.1037/xap0000028>
- Ekeocha, J. O., & Brennan, S. E. (2008). Collaborative recall in face-to-face and electronic groups. *Memory*, 16(3), 245–261.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0701807480>
- Fehr, E., & Schurtenberger, I. (2018).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human cooperation. *Nature Human Behaviour*, 2(7), 458–468. <https://doi.org/10.1038/s41562-018-0385-5>
- Festinger, L., Pepitone, A., & Newcomb, T. (1952). Some consequences of de-individuation in a group. *The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47(Suppl. 2), 382–389. <https://doi.org/10.1037/h0057906>
- French, L., Garry, M., & Mori, K. (2011). Relative--not absolute--judgments of credibility affect susceptibility to misinformation conveyed during discussion. *Acta Psychologica*, 136(1), 119–128. <https://doi.org/10.1016/>

- j.actpsy.2010.10.009
- Gabbert, F., Memon, A., & Wright, D. (2007). I saw it for longer than you: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ceived encoding duration and memory conformity. *Acta Psychologica*, 124(3), 319–331. <https://doi.org/10.1016/j.actpsy.2006.03.009>
- Garvin, C. D., Gutiérrez, L. M., & Galinsky, M. J. (2017). *Handbook of social work with groups*. Guilford Publications.
- Goodwin, K. A., Hannah, P. J., Nicholl, M. C., & Ferri, J. M. (2017). The confident co-witness: The effects of misinformation on memory after collaborative discussion.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31(2), 225–235. <https://doi.org/10.1002/acp.3320>
- Grice, H. P. (1975).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 J. L.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pp. 41–58).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Gronchi, G., Righi, S., Gavazzi, G., Giganti, F., & Viggiano, M. P. (2023). Intuitive thinking predicts false memory formation due to a decrease in inhibitory efficienc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4, 119566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3.1195668>
- Harris, C. B., Barnier, A. J., & Sutton, J. (2012). Consensus collaboration enhances group and individual recall accuracy. *Quarterl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65(1), 179–194. <https://doi.org/10.1080/17470218.2011.608590>
- Hart, K. M., & Meade, M. L. (2021). Social contagion of memory and the role of self-initiated relative judgments. *Acta Psychologica*, 212, 103189. <https://doi.org/10.1016/j.actpsy.2020.103189>
- Hirst, W., & Echterhoff, G. (2012). Remembering in conversations: The social sharing and reshaping of memori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63(1), 55–79. <https://doi.org/10.1146/annurev-psych-120710-100340>
- Horry, R., Palmer, M. A., Sexton, M. L., & Brewer, N. (2012). Memory conformity for confidently recognized items: The power of social influence on memory report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8(3), 783–786. <https://doi.org/10.1016/j.jesp.2011.12.010>
- Huang, M. (2024). Confucian culture and democratic values: An empirical comparative study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4(1), 71–101. <https://doi.org/10.1017/jea.2023.23>
- Huang, T.-R., Cheng, Y.-L., & Rajaram, S. (2024). Unavoidable social contagion of false memory from robots to huma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79(2), 285–298. <https://doi.org/10.1037/amp0001230>
- Huff, M. J., Davis, S. D., & Meade, M. L. (2013). The effects of initial testing on false recall and false recognition in the social contagion of memory paradigm. *Memory & Cognition*, 41(6), 820–831. <https://doi.org/10.3758/s13421-013-0299-4>
- Ito, H., Barzykowski, K., Grzesik, M., Gülgöz, S., Gürdere, C., Janssen, S. M. J., ... Mori, K. (2019). Eyewitness memory distortion following co-witness discussion: A replication of Garry, French, Kinzett, and Mori (2008) in ten countries.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8(1), 68–77. <https://doi.org/10.1016/j.jarmac.2018.09.004>
- Kękuś, M., Dziubańska, R., Michalak, K., Polczyk, R., Szpitalak, M., & Barzykowski, K. (2024). Protecting against misinformation: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ree techniques to reduce memory conformity.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5(4), 880–906. <https://doi.org/10.1111/bjop.12712>
- Kękuś, M., Polczyk, R., Ito, H., Mori, K., & Barzykowski, K. (2021). Is your memory better than mine?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s and determinants of the memory conformity effect using a modified MORI technique.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35(6), 1621–1630. <https://doi.org/10.1002/acp.3879>
- Kensinger, E. A., Choi, H.-Y., Murray, B. D., & Rajaram, S. (2016). How social interactions affect emotional memory accuracy: Evidence from collaborative retrieval and social contagion paradigms. *Memory & Cognition*, 44(5), 706–716. <https://doi.org/10.3758/s13421-016-0597-8>
- Koike, T., Tanabe, H. C., Okazaki, S., Nakagawa, E., Sasaki, A. T., Shimada, K., ... Sadato, N. (2016). Neural substrates of shared attention as social memory: A hyperscanning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tudy. *NeuroImage*, 125, 401–412. <https://doi.org/10.1016/j.neuroimage.2015.09.076>
- Lehman, M., & Malmberg, K. J. (2013). A buffer model of memory encoding and temporal correlations in retrieval. *Psychological Review*, 120(1), 155–189. <https://doi.org/10.1037/a0030851>
- Li, Y., Liu, Z., & Liu, X. (2022). Who did I lie to that day? Deception impairs memory in daily lif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86(6), 1763–1773. <https://doi.org/10.1007/s00426-021-01619-x>
- Loftus, E. F. (1993). The reality of repressed memories. *American Psychologist*, 48(5), 518–537.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48.5.518>
- Loftus, E. F. (2005). Planting misinformation in the human mind: A 30-year investigation of the malleability of memory. *Learning & Memory*, 12(4), 361–366. <https://doi.org/10.1101/lm.94705>
- Luhmann, C. C., & Rajaram, S. (2015). Memory transmission in small groups and large networks: An agent-based model.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12), 1909–1917.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5605798>
- Luo, H., Cai, M., & Cui, Y. (2021).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in social networks: Analysis based on Weibo Tweets. *Security and Communication Networks*, 2021, 1–23. <https://doi.org/10.1155/2021/7999760>
- Mangiulli, I., Otgaar, H., Curci, A., & Jelicic, M. (2020). An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 of the misinformation effect in crime-related amnesia claim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34(5), 1092–1100. <https://doi.org/10.1002/>

- acp.3697
- Marion, S. B., & Thorley, C. (2016). A meta-analytic review of collaborative inhibition and postcollaborative memory: Testing the predictions of the retrieval strategy disruption hypothe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2(11), 1141–1164. <https://doi.org/10.1037/bul0000071>
- Maswood, R., Luhmann, C. C., & Rajaram, S. (2022). Persistence of false memories and emergence of collective false memory: Collaborative recall of DRM word lists. *Memory*, 30(4), 465–479.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1.2021.1928222>
- Maswood, R., & Rajaram, S. (2019). Social transmission of false memory in small groups and large networks. *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11(4), 687–709. <https://doi.org/10.1111/tops.12348>
- McCloskey, M., & Zaragoza, M. (1985). Misleading postevent information and memory for events: Arguments and evidence against memory impairment hypothes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14(1), 1–16. <https://doi.org/10.1037/0096-3445.114.1.1>
- Meade, M. L., McNabb, J. C., Lindeman, M. I. H., & Smith, J. L. (2017). Discounting input from older adults: The role of age salience on partner age effects in the social contagion of memory. *Memory*, 25(5), 704–716.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1.2016.1207783>
- Meade, M. L., & Roediger, H. L. (2002). Explorations in the social contagion of memory. *Memory & Cognition*, 30(7), 995–1009. <https://doi.org/10.3758/BF03194318>
- Mojtahedi, D., Ioannou, M., & Hammond, L. (2018). The dangers of co-witness familiarity: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co-witness relationships on blame conformity. *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33(4), 316–326. <https://doi.org/10.1007/s11896-018-9254-4>
- Mojtahedi, D., Ioannou, M., & Hammond, L. (2020). Intelligence, authority and blame conformity: Co-witness influence is moderated by the perceived competence of the information source. *Journal of Police and Criminal Psychology*, 35(4), 422–431. <https://doi.org/10.1007/s11896-019-09361-2>
- Monds, L. A., Howard, M., Paterson, H. M., & Kemp, R. I. (2019). The effects of perceived memory ability on memory conformity for an event. *Psychiatry, Psychology and Law*, 26(4), 580–592. <https://doi.org/10.1080/13218719.2018.1556130>
- Multhaup, K. S. (1995). Aging, source, and decision criteria: When false fame errors do and do not occur. *Psychology and Aging*, 10(3), 492–497. <https://doi.org/10.1037/0882-7974.10.3.492>
- Newcomb, T. M., Turner, R. H., & Converse, P. E. (2015). *Social psychology: The study of human interaction*.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720708>
- Numata, T., Sato, H., Asa, Y., Koike, T., Miyata, K., Nakagawa, E., Sumiya, M., & Sadato, N. (2020). Achieving affective human-virtual agent communication by enabling virtual agents to imitate positive expressions. *Scientific Reports*, 10(1), 5977. <https://doi.org/10.1038/s41598-020-62870-7>
- Oeberst, A., Wachendörfer, M. M., Imhoff, R., & Blank, H. (2021). Rich false memories of autobiographical events can be reversed.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8(13), e2026447118. <https://doi.org/10.1073/pnas.2026447118>
- Osorio-Gómez, D., Miranda, M. I., Guzmán-Ramos, K., & Bermúdez-Rattoni, F. (2023). Transforming experiences: Neurobiology of memory updating/editing. *Frontiers in Systems Neuroscience*, 17, 1103770. <https://doi.org/10.3389/fnsys.2023.1103770>
- Otgaar, H., & Baker, A. (2018). When lying changes memory for the truth. *Memory*, 26(1), 2–14.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1.2017.1340286>
- Otgaar, H., Howe, M. L., Smeets, T., & Wang, J. (2016). Denial-induced forgetting: False denials undermine memory, but external denials undermine belief.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5(2), 168–175. <https://doi.org/10.1016/j.jarmac.2016.04.002>
- Pena, M. M., Klemfuss, J. Z., Loftus, E. F., & Mindthoff, A. (2017). The effects of exposure to differing amounts of misinformation and source credibility perception on source monitoring and memory accuracy. *Psychology of Consciousness: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4(4), 337–347. <https://doi.org/10.1037/cns0000137>
- Pezdek, K., Sperry, K., & Owens, S. M. (2007). Interviewing witnesses: The effect of forced confabulation on event memory. *Law and Human Behavior*, 31(5), 463–478. <https://doi.org/10.1007/s10979-006-9081-5>
- Pfister, R., Wirth, R., Schwarz, K. A., Steinhäuser, M., & Kunde, W. (2016). Burdens of non-conformity: Motor execution reveals cognitive conflict during deliberate rule violations. *Cognition*, 147, 93–99. <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5.11.009>
- Polage, D. C. (2019). Liar, liar: Consistent lying decreases belief in the truth.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33(4), 527–536. <https://doi.org/10.1002/acp.3489>
- Polczyk, R. (2017). The ‘memory’ misinformation effect may not be caused by memory failures: Exploring memory states of misinformed subjects. *Polis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48(3), 388–400. <https://doi.org/10.1515/ppb-2017-0045>
- Provenzi, L., Scotto Di Minico, G., Giusti, L., Guida, E., & Müller, M. (2018). Disentangling the dyadic dance: Theoretical, methodological and outcomes systematic review of mother-infant dyadic processe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9, 34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8.00348>
- Raposo, N. G. (2023). Memory distortions: An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cognitive-affective bias. In P. Fossa & C. Cortés-Rivera (Eds.), *Affectivity and learning: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neurosciences*,

- cultural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pp. 517–537).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31709-5_27
- Ribino, P. (2023). The role of politeness in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s: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view*, 56(1), 445–482. <https://doi.org/10.1007/s10462-023-10540-1>
- Riesthuis, P., Otgaar, H., De Cort, A., Bogaard, G., & Mangiulli, I. (2022). Creating a false alibi leads to errors of commission and omission.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36(4), 936–945. <https://doi.org/10.1002/acp.3982>
- Riesthuis, P., Otgaar, H., Hope, L., & Mangiulli, I. (2022). Registered report: The effects of incentivized lies on memory.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36(5), 1150–1161. <https://doi.org/10.1002/acp.3986>
- Rodriguez, D. N., & Strange, D. (2015). False memories for dissonance inducing events. *Memory*, 23(2), 203–212.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1.2014.881501>
- Roediger, H. L., Meade, M. L., & Bergman, E. T. (2001). Social contagion of memory. *Psychonomic Bulletin & Review*, 8(2), 365–371. <https://doi.org/10.3758/BF03196174>
- Romeo, T., Otgaar, H., Smeets, T., Landstrom, S., & Boerboom, D. (2019). The impact of lying about a traumatic virtual reality experience on memory. *Memory & Cognition*, 47(3), 485–495. <https://doi.org/10.3758/s13421-018-0885-6>
- Sanderson, J. A., & Ecker, U. K. H. (2020). The Challenge of misinformation and ways to reduce its impact. In P. Van Meter, A. List, D. Lombardi, & P. Kendeou (Eds.), *Handbook of learning from multiple representations and perspectives* (pp. 461–476). Routledge.
- Saraiva, M., Albuquerque, P. B., & Arantes, J. (2017). Production of false memories in collaborative memory tasks using the DRM paradigm. *Psicológica*, 38(2), 209–229.
- Saraiva, M., & Garrido, M. V. (2024). Misinformation in social interaction: Examining the role of discussion. *Memory*, 32(2), 156–165.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1.2023.2300671>
- Schacter, D. L., Guerin, S. A., & St. Jacques, P. L. (2011). Memory distortion: An adaptive perspectiv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15(10), 467–474. <https://doi.org/10.1016/j.tics.2011.08.004>
- Seamon, J. G., Luo, C. R., Kopecky, J. J., Price, C. A., Rothschild, L., Fung, N. S., & Schwartz, M. A. (2002). Are false memories more difficult to forget than accurate memories? The effect of retention interval on recall and recognition. *Memory & Cognition*, 30(7), 1054–1064. <https://doi.org/10.3758/BF03194323>
- Smith, L. G. E., & Postmes, T. (2011). The power of talk: Developing discriminatory group norms through discuss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0(2), 193–215. <https://doi.org/10.1348/014466610X504805>
- Steinmetz, J., Sezer, O., & Sedikides, C. (2017). Impression mismanagement: People as inept self-presenter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1(6), e12321. <https://doi.org/10.1111/spc3.12321>
- Szpitalak, M., & Polczyk, R. (2019). How to induce resistance to the misinformation effect? Characteristics of positive feedback in the reinforced self-affirmation procedure. *Psychology, Crime & Law*, 25(7), 771–791. <https://doi.org/10.1080/1068316X.2019.1574791>
- Thorley, C., & Dewhurst, S. A. (2007). Collaborative false recall in the DRM procedure: Effects of group size and group pressure. *European Journal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19(6), 867–881. <https://doi.org/10.1080/09541440600872068>
- Thorley, C., & Kumar, D. (2017). Eyewitness susceptibility to co-witness misinformation is influenced by co-witness confidence and own self-confidence. *Psychology, Crime & Law*, 23(4), 342–360. <https://doi.org/10.1080/1068316X.2016.1258471>
- Verovšek, P. J. (2016). Collective memory, politics,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past: The politics of memory as a research paradigm.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4(3), 529–543. <https://doi.org/10.1080/21565503.2016.1167094>
- Vieira, K. M., & Lane, S. M. (2013). How you lie affects what you remember.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 2(3), 173–178. <https://doi.org/10.1016/j.jarmac.2013.05.005>
- Vilanova, F., Beria, F. M., Costa, Â. B., & Koller, S. H. (2017). Deindividuation: From Le Bon to th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deindividuation effects. *Cogent Psychology*, 4(1), 1308104. <https://doi.org/10.1080/23311908.2017.1308104>
- Vosoughi, S., Roy, D., & Aral, S. (2018).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359(6380), 1146–1151. <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p9559>
- Vredeveltdt, A., Groen, R. N., Ampt, J. E., & van Koppen, P. J. (2017). When discussion between eyewitnesses helps memory. *Legal and Criminological Psychology*, 22(2), 242–259. <https://doi.org/10.1111/lcrp.12097>
- Walczyk, J. J., Harris, L. L., Duck, T. K., & Mulay, D. (2014). A social-cognitive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serious lies: Activation-decision-construction-action theory.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34, 22–36. <https://doi.org/10.1016/j.newideapsych.2014.03.001>
- Williamson, P., Weber, N., & Robertson, M. (2013). The effect of expertise on memory conformity: A test of informational influence. *Behavioral Sciences & the Law*, 31(5), 607–623. <https://doi.org/10.1002/bsl.2094>
- Wright, D. B., Gabbert, F., Memon, A., & London, K. (2008). Changing the criterion for memory conformity in free recall and recognition. *Memory*, 16(2), 137–148.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0701836174>
- Wright, D. B., London, K., & Waechter, M. (2010). Social anxiety moderates memory conformity in adolescent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4(7), 1034–1045. <https://doi.org/10.1002/acp.1604>

- Zacks, J. M., Bezdek, M. A., & Cunningham, G. E. (2022). Knowledge and the reliability of constructive memory. *Memory*, 30(1), 22–25. <https://doi.org/10.1080/09658211.2020.1871022>
- Zhan, B., Chen, Y., Wang, R., & Jiang, Y. (2025). Prolonged visual perceptual changes induced by short-term dyadic training: The roles of confidence and autistic traits in social learning. *iScience*, 28(2), 111716. <https://doi.org/10.1016/j.isci.2024.111716>
- Zimbardo, P. G. (1969). The human choice: Individuation, reason, and order versus deindividuation, impulse, and chaos. *Nebraska Symposium on Motivation*, 17, 237–307.

Active construction of false memory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The role of “deindividuation” in social contagion effect

WANG Hui, DONG Yan

(School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Communication within groups can lead to the spread of misinformation, which in turn creates false memories. This phenomenon is known as the social contagion of memory. Some studies focus on factors like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information content. Many works highlight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factors. However, these studies often treat senders and receivers as independent units. More research is needed on the social contagion of memory, especi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action dynamics. Interaction patterns are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interaction dynamics. They may affect the strength of the social contagion effect. For example, in free-for-all interactions, individuals may be more likely to accept misinformation. This often occurs to maintain social goals or a positive image, leading to a “deindividuation” response. This response can persist and alter memory, causing the spread of false memories. In turn-taking interactions, deindividuation is less likely, and the social contagion effect is weaker. Future research should accurately measure deindividuation and explore its role in the social contagion effect. It should further uncover the mechanisms behind this effect.

Keywords: false memory, social contagion effect, interaction dynamic, deindividuation, interaction pattern